

阿中友好关系中的民间外交

[苏丹]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摘要: 本文旨在探寻中国和阿拉伯民族民间外交的古代历史源头, 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和阿拉伯民间外交关系在现当代的形成与发展, 主要解答以下几个问题: 中国和阿拉伯历史上民间外交先驱所付出的努力是否为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起了铺路奠基的作用? 民间外交工作的本质及其开展形式如何? 双方民间外交的现状怎样, 如何拓展民间外交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空间? 在建立阿中双方全面、富有成效的战略伙伴关系过程中, 民间外交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本文还对如何进一步开展阿中民间外交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中阿关系; 阿拉伯文化; 民间外交; 中国与中东; 非政府组织

作者简介: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博士后, 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北京 100871)。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8)06-0010-09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一、阿中民间外交的历史追溯

公元前193年与120年, 汉武帝两度派张骞出使西域(中亚与西亚地区)。史料显示, 张骞曾抵达伊拉克地区(当时被称为“条支”), 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通往伊拉克及周边地区商道的详细资料。^{[1]746} 张骞的出访从此打通了中国通往西亚的道路, 标志着阿中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始。同时期的阿中民间外交活动也相当活跃, 成书于公元5世纪的《后汉书》以及著于9世纪的《通典》清楚地记载了早在公元120年, 来自埃及、叙利亚等国的阿拉伯商人就曾抵达汉朝宫廷。这些民间交往的存在, 使东亚至西亚陆上通道和由红海经阿拉伯湾至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早在汉朝时就被中国人与阿拉伯人所熟知。^{[2]150-151}

北魏时期(386~534年), 洛阳城(今河南省境内)中聚集了大批阿拉伯侨民, 这些民间外交使者们已充分融入了中国社会。其中的穆斯林传教士与基督教传教士在阿中民间外交发展中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628~638年间(虽然这一时间尚未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有四位穆斯林使者曾到达中国, 其中一位向广州进发, 另外三位则前往泉州, 一人可能到过当时繁华的商业中心——扬州。这些穆圣弟子曾为传布伊斯兰教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而今, 他们中的一些人长眠于广州、泉州, 并受到世人的无限爱戴与尊敬。^{[3]135-148}

阿拉伯基督徒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则更早，635年哈里发欧麦尔时代初期，伊拉克摩苏尔僧侣（中国文献中称“乌鲁比” أولوبي）在中国土地上掀开了基督教景教传播史的新篇章，唐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曾接见过这位僧侣，并应允他在唐朝国都建造教堂。^{[4]290}1625年西安出土的雕塑证明大沙姆地区曾派遣景教使团来华，而之后的阿拉伯文献资料也显示：当时的中国有基督教徒的活动踪迹。^{[5]490}伊本·纳迪姆在《目录》一书中提到他曾于伊历377年遇到一位从中国归来的纳季兰僧侣，并援引他的话说，有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传教士在中国积极开展基督教的传播活动。^①

唐朝时期阿拉伯在华侨民数量不断增长，阿拉伯人的活动范围甚至覆盖了全中国的主要商业城市与港口。第一批穆斯林传教士与阿拉伯基督教传教士所从事的民间活动，在历史上为阿拉伯民族与汉民族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51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向中国派遣了一支阿拉伯外交使团，标志着阿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②从那以后，阿拉伯商人、航海家、地理学家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这些来华阿拉伯人包括著名伊斯兰学者、阿曼商人阿布·阿比德·本·贾希姆^③，他于752年离开巴士拉到访中国。据传，他曾多次访问过中国。^[6]

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与航海家也频繁出访阿拉伯国家，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在其航海日志《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描述了中国通往阿拉伯地区的道路，其中提到了诸多港口，如索马里港口泽拉、亚丁港、苏哈尔、俄波拉^④和巴士拉等港口城市。^⑤762年，唐代文人杜环在库法城逗留11年后回到中国，著有《经行记》，书中记述了阿拉伯地区的风土人情、繁荣的经济和管理有序的城镇，向中国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阿拉伯画卷。此外，杜环在书中提到了两个民族进行文明对话的新成果：当时中国的画师、织匠已经在伊拉克地区安居立业。^⑥同时，《旧唐史》、《新唐史》等中国的文献也描绘了阿拉伯文化的灿烂风貌，《唐史》中还刻画了真主使者穆罕默德的光辉形象。在这一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地区间的民间文化交流促成了古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文明对话——长安会议。李约瑟曾提到，当时来自阿拉伯、古叙利亚和波斯地区的学者纷纷前往唐朝古都长安，与那里的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和东京（今越南北部）学者相聚于亭台楼阁之上，共谈宗教、文学之学问^{[7]125}，此类聚会成为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民间外交最早、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之一。

在唐代，不仅有阿拉伯民间使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知，中国学者也同样负笈西行，渴望从阿拉伯穆斯林学者那里寻求知识。伊本·纳迪姆在《目录》中提到，一位中国学者曾造访阿拉伯著名化学物理学家穆罕默德·本·扎克里雅·拉齐（850~925年），向拉齐学习科学知识，这位中国学者在拉齐家中逗留一年左右，并花六个月时间誊抄了盖伦（129~199年，古罗马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大师）的著作。^{[5]25}

唐代的阿中交往催生了第一代精通汉学的阿拉伯专家，伊拉克尸罗夫商人、作家苏莱曼，就是阿中民间外交的先驱，早在公元851年他已率先为世界带去了中国的讯息。作为第一位中国学家而非纯粹的商人，他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详细描绘了唐朝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苏莱

①参见《旧唐书》（第198卷）有关西方民族的条目。

②参见艾哈迈德·本·素欧德：阿曼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中的作用，文学论坛文化节上的演讲（2001-02-11）。

③译名根据马建春：《大食·西域与古代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④贾耽称乌拉国——译者注。

⑤参见《旧唐书》（第148卷）有关阿拉伯的条目。

⑥参见杜环：《经行记》，引自杜佑：《通典》。

曼是世界上介绍中国饮茶习惯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位记录唐朝与唐朝皇帝对阿拉伯人及穆斯林的优惠政策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作家。苏莱曼曾写道：“在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每逢节日，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尚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8]43-57}

阿拉伯人在中国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不仅包括民间使者之间的直接对话，甚至直达宫廷，苏莱曼游记与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对此都有记载，其中有伊本·瓦哈卜与中国皇帝关于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谈话记录。^{[8]72-73}唐、宋时期，阿拉伯人被允许掌管国家机构中的重要行政部门，如中国皇帝任命阿曼商人（中国史料称辛押陀罗）为执掌移民的官员，任命艾布·阿里·伊卜拉欣为对外贸易督察官，任命商人蒲寿庚为中国（广州）市舶司。这些阿拉伯管理者建立并管理了古代最早的自由经济区，如广州港、泉州港和扬州港等。^①

宋朝年间阿拉伯民间外交人士受到了中国朝廷的礼遇，阿拉伯商人图帕里（Tu Pali）于 1008～1010 年间因加强民族对话之功荣获皇帝封号“美德将军”^{[1] 753, 757}。

据阿中民间外交先驱之一的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载，阿中民间外交活动在中国元朝达到了顶峰。阿拉伯人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科学和外交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之中涌现出了行政官员如艾杰尔·夏姆斯丁·欧麦尔、伟大的工程师如设计并建造了元朝大都（北京城）的叶海亚·道希尔，1250～1308 年在中国工作并成为翰林院成员的阿拉伯学者尤素福和发展了中国元朝天文学的叙利亚学者尔萨等。^{[9]56}他们还在中国官方外交活动中充当了元朝统治者的使臣和商业代表的角色，在波斯、印度、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地区履行商贸和外交使命。1301 年，元成宗曾派阿拉伯商人穆阿兹丁到索马里购买狮、豹、虎等珍贵动物。^{[10]433-434}

元朝的中国航海家如汪大渊也曾于 1328 和 1334 年两次到达阿拉伯国家，归国后撰写了极有价值的《岛夷志略》，记述了有关埃及、马格里布地区及阿拉伯半岛的重要信息。

1405～1433 年间，阿中民间外交经历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则是：著名的中国航海家郑和启程西行，途经阿拉伯各地区，还派遣代表团前往麦加、伊赫萨伊等地。

阿中民间外交活动轰轰烈烈地延续了几个世纪，不断推动了双方在文化、政治、外交、经济各领域关系的发展。15 世纪中叶，欧洲列国发动了对亚洲、非洲的侵略战争，使阿中外交渠道受阻，但此时民间外交却又一次发挥了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据中文史料记载，公元 17 世纪前后，也门传教士克马伦丁·奥斯曼到达中国，在宁夏银川生活了三十多年，并倾其一生心血向中国人民宣传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1628 年 7 月 13 日，奥斯曼逝世后被葬于滚钟口，1644 年，当地穆斯林为纪念他而修建了墓穴和清真寺。^{[11]25}

与此同时，中国的民间外交使者也肩负着连接两个民族文化纽带的重任：马明心哈吉（1719～1781 年）曾出海远行抵达也门，师从著名的苏菲派教长齐叶尼^{[11]25}，在也门求学十二载；马复初哈吉于 1841～1848 年间游历麦加圣城、安曼、亚丁、开罗等地，归国后撰写了著名的《朝觐途记》。^{[3]164}著名的阿中外交先驱者之一穆罕默德·哈吉·阿里冲破险阻，从苏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广州，开办了最早的阿拉伯商贸办事处。在结束 10 年的经商生涯后，穆罕默德携中国妻子回到自己的祖国苏丹，在他之后，一批具有中国血统的苏丹人成长起来，为加强阿中

^①参见“从伊斯兰时代到 19 世纪阿曼与中国的关系——阿曼人在中国的文化作用”，教科文组织阿曼国家委员会主办文化节作品集前言（2006 年 9 月），第 27-29 页。

民间外交、促进直接经贸往来和社会联系贡献了一份力量。^{[12]10-12}

到 20 世纪初,阿中民间外交肩负起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民族斗争的政治任务,并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支持。中国外交活动家如尔萨·马武玲(عيسى ماوولنج)率代表团于 1937 年 12 月~1940 年 6 月年间访问阿拉伯各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寻求阿拉伯政府和民间支持,代表团到达麦加圣城时,还受到了沙特国王和金融大臣阿卜杜拉·苏莱曼的接见,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斗争表示了同情与支持。^{[13]29-30}

二、阿中民间外交的发展透视

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予以热切关注和大力支持,阿中民间外交即便在长征途中亦未中断。据中外史料记载,黎巴嫩医生乔治·海德姆^①在中国革命的感召下,满怀热情地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当中,不仅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保持密切交往,更于 1937~1945 年间跟随红军长征,成为一名随队军医和战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 年他随解放军一道解放了北京城,又同战友们一起从解放战争的战场转移到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事业中,^{[14]1-29, 61}并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和“文革”等重大事件。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运动团体与和平组织便领导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政府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唤醒全民意识的运动;埃及的青年工会政治运动和一些埃及国会议员于 1950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埃及国会内外发起广泛对话,呼吁埃及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5]145}

在阿中民间外交的发展中,还有像艾哈迈德·赫伊尔这样奋斗在世界和平第一线的阿拉伯外交使者。他是当时世界和平运动维也纳总部的重要领导人,在亚非欧的民间讲坛上领导了保卫中国的国际性运动。^②20 世纪五十年代,艾哈迈德·赫伊尔翻译了毛泽东著作,参加过亚非记者协会、亚非团结组织等,并成为中国友协的一员。他的作品和他在政治宣传领域的活动使中国概念很早就已在非洲牢牢扎根,并为中苏(丹)友好组织于 1956 年前的成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9]328}

其他一些组织,如阿卜杜拉·欧贝德领导的苏丹青年联合会曾派遣代表于 1955 年 9 月同世界青年运动的其他团队一起访问中国。归国后,欧贝德撰写了一部关于中国之行的重要作品,埃及思想出版社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我们盼望此书为苏丹人民促使政府承认中国的努力作出贡献。”^[16]为了使苏丹政府正式承认中国,这位活动家和他的组织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中国“团结之行”结束后四年,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16]

苏中友好协会为推动苏中两国建交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67 年 9 月,该组织曾派遣一支代表团访问中国。^③此外,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起,该组织在苏丹各大主要城市建立起分支机构,其中位于瓦德-迈达尼(واد مدني)的苏中友好协会分部曾拜访中国驻喀土穆使馆,对中国召开党代会表示祝贺,并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寄去贺信。1976 年 9 月,毛泽东主席辞世时,苏中友好协会特

①中文名为马海德——译者注。

②参见《北京周报》1969 年 11 月 5 日,第 45 期第 8 卷第 21 页,另外可参见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中阿关系——苏丹案例研究》(未出版书稿)。

③此内容可参见哈希姆·拜赫柏尼:《1955 年至 1975 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政策》(阿拉伯语),阿拉伯研究机构 1984 年版,第 242 页。

升黑色旗帜并张贴毛主席的遗像以示哀悼。^①

在中国，阿中民间外交活动始终走在支援阿拉伯事业的国际浪潮前列。在北非，阿中民间外交活动与埃及人民的斗争紧密配合，1956年与他们共同抵抗英、法、以三国的侵略。民间外交组织诸如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组织了多次群众游行，该委员会与其他组织还领导中国人民组成了志愿军，支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投入了“近代革命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战争”。当时前往埃及驻北京大使馆报名登记参加志愿军的中国公民达25万之多。^{[15]147}中国民间外交组织与群众组织广泛活动，促使中国政府采取更坚决的态度应对由西方和以色列构成的反埃敌对势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组织也是在中埃人民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中诞生的。1956年11月3日，大批中国公民为声援埃及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同一天，在这个著名的广场上成立了中埃友好协会。^{[15]147}

当埃及、叙利亚人民为阿拉伯联盟的成立而喝彩时，北京的中阿友好组织也表示了极大的支持。1958年6月23日，中阿友好协会在开罗诞生，同时宣布将在叙利亚和也门建立分部。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尤其在1967年6月和1973年10月两次中东战争期间，为声援阿拉伯国家，上述团体机构在中国各大城市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游行，散发了传单与手册，加深了中国各界对阿拉伯国家斗争的认识和理解。^{[9]88, 92}

大量史料证明，大索马里同盟、中非友协、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在中索正式建交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如中非友协支持索马里人民为争取独立与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协会会长在会见索中民间外交使者、大索马里同盟主席穆罕默德·哈桑哈吉时表示：“中非友协支持索马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追求国家独立的斗争。”穆罕默德·哈桑哈吉的北京之行意味着中索建交准备工作已完成。在他访华之后不到一个月，即1961年12月14日，中国和索马里宣布正式建交。

中阿各友好组织对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人民的支援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开始。当突尼斯政府和人民坚决要求法国军队撤出军事基地却遭法国再次侵犯时，中阿友好组织向突尼斯人民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和中非友好协会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支援突尼斯，呼吁国际社会以坚定的立场制止侵略，制止在别国驻扎军事基地。1958年12月，这些组织支持摩洛哥要求美国解散在摩基地的立场，支持“摩洛哥不是美国殖民地，不接受委任统治”的立场。同一时期，中阿友好组织还积极声援利比亚政府要求撤除美国驻利军事基地的决定，并在声援游行的电报中将该决定称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对美帝国主义的又一次打击。”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阿友好组织表达了一贯的立场，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的支援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到法国占领军撤出阿尔及利亚为止，从未间断。

中国领导人对阿中民间组织和阿拉伯民间外交的代表人物也给予高度评价和重视，中国总理坚持亲自接见来华访问的民间代表即为力证。事实证明，中国民间外交组织不仅成功地地为阿尔及利亚的斗争赢得了支持，更为阿人民招募了数千名志愿军。^{[9]135}在中国全民支持阿斗争的形势下，中国政府于1958年9月23日不顾苏联反对，承认阿临时政府，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公开反对莫斯科立场的国家。1961年11月，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在世界和全国范围内发起运动，要求释放被关押在法国占领军监狱中的阿尔及利亚领袖本·贝拉及其战友。

^①可参见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苏中关系》，苏丹研究中心2005年版。

中国民间外交组织始终给予中东各国人民强有力的支持，并与他们一同投入正义斗争中，“团结巴勒斯坦人民日”这一传统保留至今。已故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曾于1964年3月17日访问中国，访问期间，阿拉法特宣布在北京设立巴解组织联络处，这是巴勒斯坦人民设在阿拉伯世界以外的第一个办事处。^{[9]135}同时，中国于1964年3月宣布遵守阿盟关于断绝与以色列及其贸易船只往来关系的决议。^①

在阿中人民团结合作的推动下，在世界和平力量的鼓舞下，阿中友好协会的工作取得了进步。1958年9月，一个包括团结与和平运动发起者在内的伊拉克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同时中伊友好协会宣布成立。

中国民间团体的活动也覆盖了阿拉伯湾地区，亚非团结委员会与中国伊斯兰协会高度关注阿曼人民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英勇战斗，并于1958~1959年间同阿曼人民一起组织了多次声援活动，呼吁英国撤军。

此外，沙特的个案可被看作是民间外交为促进中阿关系、铺平正式建交道路而发挥先驱作用的成功典范。虽然当时中沙并未建交，但中国穆斯林团体自1949年建国以来一直是维系两国关系的纽带，始终保持与沙特高层负责人和沙特伊斯兰组织的往来会晤。同时，沙特的伊斯兰组织和团体也与中方负责人维持着良好的联系，直至1990年两国建交。目前这些组织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7]

从索马里到埃及，从叙利亚到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中国民间外交组织始终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斗争事业予以巨大支持，这一切使得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并帮助不断壮大的中国友好组织和协会通过向各自政府施压，促使各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目标终于在1990年7月沙特与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圆满完成。20世纪九十年代，虽然双方的民间友好协会规模不断扩大，活动范围日益拓宽，但伴随着冷战结束，其整体活动情况却显露出衰退趋势。

要摆脱衰退和被误读的境况，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友好组织应该寻找恢复其职能的新机制。自20世纪九十年代初起，这类组织所能获得的物质上、政治上和宣传上的帮助越来越少，过去支持这些组织开展工作的政治力量也不再对其给予关注。领导阿拉伯世界和平、团结、友好运动的老一辈革命家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协会从民间团体转变为官方组织，除了一些诸如庆祝中国国庆活动的正式场合，它们的活动几乎已不被社会所感知。笔者近十五年来密切关注阿中关系，也从未发现这些组织举行过任何群众活动或进行过任何宣传。

但近两年来，一些阿中有识之士感到，想要实现阿中伙伴关系计划，恢复两个友好民族间的交流，就迫切需要“复活”这些组织。自2000年起，阿中学者、官方和民间组织开始思考新的机制，将两个民族间的关系从商业阶段的传统政治关系转向复兴两个古老民族深层潜力的伙伴关系。学者们的努力促成了旨在发展全面合作的“阿中论坛”架构的形成。论坛公告指出了“支持并促进双方对话和理解”的重要性^②，论坛工作计划也强调开展、加强中阿友好协会和阿中友好协会间合作与联系的必要性，以及加强该组织在实现非官方联系中的重要性。^③虽然计划中还未明确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工作和有效方法，但回顾这些组织和协会以往的功绩，我们可以看到，它们

①参见《巴勒斯坦局势》（阿文杂志），1974年8月，第37期。

②参见《中阿合作论坛公告（全文）》，埃及，2004年9月14日。

③同上。

的作用远远超出建立非官方组织联系的范畴，而是为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巩固了中国对待阿拉伯事业的官方立场。目前，这些民间组织又扛起重任，努力将阿中关系推向全面伙伴关系。

三、阿中民间外交前景期待

2006年11月28~29日，阿中（友好）关系大会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这是阿中民间外交史上的又一件大事。该会的口号是“民间友谊——连通血脉的坚实纽带”。共有86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由铁木尔·达瓦买提率领的中阿友好协会代表团40人，以阿盟副秘书长南希·巴吉尔女士为首的阿盟代表团和包括苏丹在内的各阿中友协代表团以及诸多关心阿中关系发展的人士。中国高度重视此次大会，将之定名为“中阿友好大会”，而阿拉伯国家和主办方则称之为“关系大会”。

此次大会产生了多项重要建议与提议：

(1) 建立中阿友好大会机制，确定每两年定期召开一次大会，由中阿各国有条件的组织承办；

(2) 建立城市管理与发展的信息共享、交流合作的民间机制，重视建立中阿姐妹城市；

(3) 决定成立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总部设于喀土穆，该联合会在阿盟统一管理下开展工作；

(4) 联合会成员由大会参加国代表构成，联合会主席采取轮流制，由中阿友好大会主办国的友好组织负责人担任，在每届大会举行时进行轮换；

(5) 阿中友好协会联合会在总部设常设秘书处；

(6) 2006年11月29日为“阿中友好日”，阿拉伯各国、阿盟和中国将通过各地的友好协会共同庆祝。

尽管“阿中合作论坛”工作计划和公告以及2004年海合会和中国达成的框架协议为阿中伙伴关系的建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但迄今为止，该计划仍然停留在有待落实的提议阶段。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 各个协会应恢复其民间身份，激活内部的民主体制。长期以来，源自政府的监管和限制阻碍了这些组织作为民间团体所能发挥的效用；

(2) 政府应给予这些组织更大的活动自由；

(3) 阿盟每年应向阿中友好组织提供帮助，以协助它们完成任务。为重振中国和阿拉伯各地友协活动，阿盟还应在预算中新增条款给予支持；

(4) 为方便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阿拉伯各国政府应给予协会财政支持；

(5) 协会应通过各种办法从企业家团体中获得资金支持，尤其是那些与中方有贸易往来的公司企业。黎中友好合作组织在募集社会赞助和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6) 组建强有力的执行部门，负责在每年或每两年召开的大会上对各协会活动进行评估，该部门或可由原阿中友好协会的相关部门重组形成；

(7) 每个协会组织应每年或每两年向该部门或协会总部提供可行性工作方案；

(8) 向活动能力最强的阿中友好协会颁奖，该奖项由大会或指定部门评定；

(9) 保证女性在阿中友好协会领导层中占有一席之地，妇女力量的缺失将阻碍协会工作的开展；

(10) 各协会应重视开发其经济部门的职能,并在原本忽略经济因素的协会中设立经济部门和商务部门。这类部门不妨组织阿拉伯企业家前往中国,帮助他们同中国当地希望了解阿拉伯市场的公司共同举办商业展览会等。同时,该部门应协助中国使馆和中国的友好协会在当地建立一批涵盖商业、投资及投资法内容的商务、经济、投资信息中心;

(11) 各阿中友协可在本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协助下进行中小规模投资,以保障为实现伙伴关系计划而开展的文化活动所需的资金。中国妇联组织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12) 发挥各协会文化办事处职能,开展以中国为主题的书展、摄影展等;

(13) 作为民间相互了解的媒介,协会应推广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旅游事业;

(14) 为恢复中阿友好协会的活力,应组建中阿友协和阿中友协共同联络委员会,协调各方立场、工作和活动;

(15) 阿中、中阿友协应进一步建设成为“阿中合作论坛”各大官方会议的监督机构;

(16) 组织阿拉伯学者和记者与中阿友协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作,并组织互访。

四、结语

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之间的民间外交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历代先驱为加强两个民族间的理解与联系付出了巨大努力,为两个民族外交关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历史证明,正是阿中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民间外交,才为国家间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促进了两民族共同履行宏大的政治决策和经济计划。

如今,双方民间外交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将伙伴关系建设计划从提议转变为现实。同时我们也期望民间外交能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阿中友协振兴重组后,再成立一个协调共同工作与立场的中阿联合委员会。此外,从7世纪起至今,阿拉伯伊斯兰教组织和阿拉伯基督教组织为巩固民间外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应鼓励双方宗教机构代表继续为加强中阿互信与对话发挥作用。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是,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阿友好协会有必要回顾历史,追忆先贤。中国的协会和组织应积极倡导发行相关的介绍读物。我们重视并真实记录上一代开拓者的伟大贡献,是为了下一代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他们的宝贵经验,使这些民间外交的遗产不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遗落。

关注阿中友谊前途的仁人志士,应努力振兴和重建曾在阿中民间外交历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组织,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当代民间外交仍需要这些组织继续发挥作用。在此,笔者建议,在下一届阿中友好大会召开之时,应出版涵盖阿拉伯各地区友好协会历史的介绍性读物。大会应责成各阿中友好协会收集该组织的历史材料与相关文件,并指定责任委员会负责采编收集的材料并公开出版。还可以发行阿中两种文字的季刊,登载阿中双方友协的各种活动,讨论阿中关系发展问题。

我们现在走在两千多年前阿拉伯国家和中国民间外交先驱们开辟的道路上,这是一条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人民不断努力而铺设的道路。阿中民间外交之舟凭其卓越持久的战斗力,历经风雨,向今天的我们驶来。希望将第一届喀土穆阿中友好大会能成为我们真正实现伙伴关系而迈出的第一步。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讲师、2006级阿拉伯语博士研究生周放译介)

[参考文献]

- [1] 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历史联系回顾[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 [2] 赫斯.F. 中国与东方罗马[M]. 莱比锡与慕尼黑,乔治·赫斯.上海和香港:凯利和华尔士出版社,1885.
- [3]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伊斯兰教产生至二十世纪阿拉伯半岛与中国的历史关系[J]. 阿拉伯湾和阿拉伯半岛研究,1999(92).
- [4] 海迪·阿莱维.中国新事物[M]. 伊拉克:文化视野出版社,2000.
- [5] 伊本·纳迪姆.目录[M]. 开罗:埃及拉赫曼出版社.
- [6] 曹菊华.十二十三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商贸[M]. 弗雷德里奇·赫斯,W.W. 洛克希尔,译,注.皇家科学学院出版社,1911.
- [7] 李约瑟.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M]. 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
- [8] 抵达印度和中国的尸罗夫人之行(公元 851 年,伊历 227 年)[M]. 巴士拉:巴士拉出版社,1961.
- [9]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苏丹案例研究[D]. 1996 年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 [10] 陈德芝,韩儒林,等.元朝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1]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也门和中国 50 年的友好关系[J]. 大马士革: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2006(28).
- [12]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哈吉·阿里——中国第一所苏丹贸易办事处创建者[J]. 今日中国,2005(5).
- [13] 铁为英.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来自中东的援助[J]. 阿拉伯世界,1991(2).
- [14] 夏毕洛·马海德——贤明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在中国[M]. 悉尼:塞朴拉斯出版社,1993.
- [15]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埃及(中)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J]. 国际政治,1997.
- [16] 阿布杜拉·欧贝德——中国民间的苏丹人[M]. 大马士革:思想出版社,1956.
- [17]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伊斯兰组织在沙特与中国建交道路中的铺垫作用[J]. 科威特大学阿拉伯半岛研究中心,2005.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in Arab-Chinese Friendly Relations

Gaafar Karar AHMED

Abstract The article tries to dig out the historic origin of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Arabians, and in turn, to discuss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expected to be talked over in this article, such as: Did the trailblazer of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really pave the way for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establishment? What's the basic character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and how does it carry out its activities? How's the situ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now and how to stimulate it? To what extent can this diplomacy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fellowship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Moreover the author ends the paper with some suggestions concerning how to develop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Key Words Sino-Arab Relations; Arab Culture; Non-governmental Diplomacy;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李 意)